

商周文化比较研究

王晖



人民出版社

商周文化比较研究

商 周 文 化 比 较 研 究

王 晖 著

人 民 大 版 社

责任编辑:张昭军

装帧设计:尹凤阁

版式设计:诸晓军

责任校对:常再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王晖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

ISBN 7-01-003168-1

I . 商…

II . 王…

III . 比较文化-中国-商代-周代

IV . K22

商周文化比较研究

SHANGZHOU WENHUA BIJIAO YANJIU

王 晖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年5月第1版 200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15.125

字数:401千字 印数:1~2,000册

ISBN 7-01-003168-1/K·629 定价:29.80元

序 —

陕西师范大学王晖教授的力作《商周文化比较研究》即将出版，承他再三要我在这里写几句话，我想这大概是由于我一直推崇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这部论著的要义能有所体会吧。

谈到中国文明的发展，人们常艳称三代。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历史长河中非常漫长的段落。有些人习惯于背诵朝代顺序，轻易以夏商周与秦汉以下各朝类比。实则两周八百余年，加上商代约六百年，已有一千四百年；再加夏代四百多年，就有一千八九百年。周亡时人去回顾夏朝始建，其距离犹如晚清之与东汉末年。在这样久长的时间里，即使当时社会演进迟缓，也必然有过很大程度的变迁。这正是历代学者经常谈论三代因革问题的缘由。

首先从学理角度论述这一问题的，是孔子。在《论语》中，可以读到他主张三代之礼先后因袭，又均有损益，其中心思想，应当是夏商周的一脉相承。此后各个时期的学者，尽管学派与见识不同，对于三代制度文化的关系的看法，大体都不超出这种思想的范围。

近代对这一观点首持异议的，是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王国维的新见解，是在他深入研究新发现的殷墟甲骨取得惊人创获之后提出的。1917年9月，他在上海作《殷周制度论》，一开头就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认为“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而“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

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王国维的见解迅速得到广泛的信从，虽有少数学者（包括他在清华的大弟子徐中舒先生）反对，但仍在学术界占有了主流地位。

不同意王国维先生见解或类似说法的声音，最近一些年逐渐增强了。这大多来自考古学者，例如王晖教授援引及的张光直先生，在其《中国青铜时代》中便有好几篇论文专论这一问题，如《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殷周关系的再检讨》、《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等，力主“三代都是有独特性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组成部分，其间的差异，在文化、民族的区分上的重要性是次要的”。

有关问题于国际上也常引起讨论。例如 1987 年 1 月，日本《读卖新闻》社、东方书店在东京组织了题为“中国古文字与殷周文化”的公开研讨会，有樋口隆康、裘锡圭、伊藤道治、松丸道雄等先生和我参加，讨论的焦点，正在于殷周文化间的关系。由此可见，这一问题因其性质重要，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王晖教授这部《商周文化比较研究》，是研究这一问题的最新成果。书内大量征引卜辞、金文与文献资料，“从神权崇拜、思想文化、制度礼仪文化、习俗文化和文化渊源等方面比较全面地讨论了商周文化的异同问题，认为商周文化异大于同。”他的探索无疑将推进古代文化的比较研究，增深我们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理解认识。至于书中随处可见的思路新颖、引人深思的论点，就不是我所能在这里一一列举的了。

李学勤

2000 年 7 月 18 日晨

序 二

我与王晖同志相识于先秦史学会的德阳年会上。在这次会议上,我与陕西师大的赵世超先生及王晖同志晤谈甚洽,知王晖同志不仅对于古文字研究下过不少功夫,而且对于先秦史的研究颇有兴趣。德阳会议后我们便时常飞鸿来往,研讨学问。他于1996年来北京师范大学随我攻读博士学位。由于他的刻苦努力,成绩显著,被研究生院批准破例提前毕业,获得学位,并且被遴选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优秀研究生。他的学位论文《商周文化比较研究》在答辩之前曾经送请京城诸多名家审阅指教,受到好评。诸位专家的鼓励,更增强了王晖同志的信心,在毕业之后,他又不停地钻研相关问题,将原来学位论文中存目而没有打印出来的部分补齐,并依照专家们的意见进行了一些加工修改。王晖同志的《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一书,虽然是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完成的学位论文,但实际上是他多年研究心得的结晶。如果没有长时间的学术积累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在短时间内是不会有如此分量厚重的专著出现的。

商、周两代是我国上古时期最为重要的两个时代,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这两个时代的关系,早在孔子的时候就提出了“损益”的观点。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所谓损益,实质上是一种批判继承。关于夏

商周三代间制度文化损益的内容，汉人认为“殷因于夏，尚质；周因于殷，尚文”（《汉书·杜周传》），“文”、“质”之说，虽然比较模糊，但却不无道理，汉儒将三代的变革称为“文质礼变”，似乎是可以接受的看法，至于后儒用三纲五常之说解释“损益”，则是以今例古而不可信的。商周两代文化之间，从根本上说，应当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没有继承就谈不到损益，没有损益也就谈不到发展。王晖同志的《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之一就在于揭示了商周两代文化的不同之处，从而使人们对于商周文化的“损益”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商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学者们早就关注的问题，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可以视为这项研究的最有名的论著。王国维在这篇文章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观堂集林》卷十）此后专家们关于殷周制度文化的比较研究，无论是拥护或是反对这一论断，但却都围绕这一论断进行。王晖同志是原则上赞同王国维先生此说的，但他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重新的探讨和归纳。可以说，他的研究实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这对于学术界重新认识商周两代的制度文化显然是有意义的事情。特别应当提到的是，王晖同志的研究比较恰当地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所以他在书中所提到的许多新颖论析不仅由于立论基础坚实而令人首肯，而且对于说明全书主旨，也皆颇有重要作用。他对于甲骨卜辞、青铜彝铭及古代文献的研究都有相当水平，所以书中引用材料丰富，显示出丰厚的学识基础。《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一书注重论据，多方考证，这在治学上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态度。

还应当提到的是陕西师大是学术积累丰厚的学术重镇，拥有一大批在海内外学术界有影响的前辈学者和中青年学术骨干，特别

是在中国古代史和先秦史研究方面更有优秀的学术传承,这些年,在总体科研实力上又有长足发展。王晖同志多年学习和工作于此,受到优秀学风的熏陶和许多师友的指教帮助,再加之以他自己的勤敏好学,所以能有可观的学术功力,成为他后来在北京师大攻读学位时取得很大成绩的重要保证。显然,王晖同志在商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

晁福林

序于北京师范大学四合院南楼寓所

时当 2000 年岁初瑞雪后一日

目 录

序一	李学勤(1)
序二	晁福林(3)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商周天神上帝及其文化圈比较研究	(18)
第一节 商代的上帝崇拜及其演变	(18)
一 商人上帝崇拜与祖先崇拜的关系	(18)
二 商人上帝原型与日神崇拜	(24)
三 商代上帝的主神地位及其相关问题	(35)
四 西周春秋时期的上帝与至上神	(47)
五 战国秦汉间至上神上帝的转变	(54)
第二节 周代的天神崇拜	(66)
一 周代天神所在地与岐山、嵩岳崇拜	(68)
二 崇山、冢山之名与周代天神的性质	(75)
三 周代的天神形象与混沌氏中央之帝	(81)
四 “天道多在西北”与天神——山岳文化圈的 地域分布	(88)
第三节 上帝天神两大文化圈比较概说	(100)
第三章 商周思想文化比较研究	(104)

第一节	论商代神权独尊、巫祝贞卜至上的 神本时代	(104)
一	王权与神权	(105)
二	甲骨占卜：沟通神鬼和商王关系的手段	(107)
三	巫祝贞人：沟通神鬼和商王关系的神人	(111)
第二节	论周代尊天保民、天人合一的 时代特征	(130)
一	周人文武时代对殷代思想文化的继承 与改造	(132)
二	周代神权思想的演变	(160)
第三节	周代思想模式的大突破与中国文化的 轴心时代	(171)
一	周人思想维新运动与中国历史轴心时代的 形成	(173)
二	西周思想维新运动与两周历史经验的 总结思潮	(181)
第四章	商周制度文化比较研究	(209)
第一节	周代礼仪制度的演变	(209)
一	论周代礼仪文化的多元现象	(210)
二	周公制礼作乐说与周初制度的变革	(232)
附录一	从康簋铭看西周井田形式及宗法关系 下的分封制	(259)
附录二	季历选立之谜与贵族等级名号 传嗣制	(271)
第二节	商周宗法制与继承法比较	(285)

一	商代宗法制问题	(285)
二	西周宗法制度新证	(309)
第三节 商周分封制及其社会政治组织			
	比较	(321)
一	殷周分封制比较研究	(322)
二	商周社会政治组织类型比较研究	(328)
第四节 商周婚制之别及其周代同姓不婚的			
	历史成因	(358)
一	商代婚制的特点	(358)
二	周代的婚制特点	(361)
三	周代同姓不婚礼俗的成因新探	(364)
第五章 商周习俗文化及文化渊源比较研究			
		(380)
第一节 商周习俗文化及文化渊源研究的			
	意义	(380)
第二节 商周妇女地位的文化差异比较			
一	商代“牝鸡之晨”的现象与东夷重女轻男	(386)
二	周人“牝鸡无晨”观与周礼中的妇女地位	(391)
三	商周妇女地位差异与不同文化习俗观念的	
	比较	(394)
四	余论	(399)
第三节 周代大礼返本归朴说			
一	祭祀制度中返本归朴现象	(400)
二	礼乐制度中崇尚质朴的现象	(407)

三 周代大礼返本归朴的原因	(411)
第四节 周族的文化渊源与周人迁徙考	
——周族烈山氏两后稷时代考辨与	
上古甥舅相承制	(414)
一 烈山氏后稷与周族后稷为甥舅关系说	(415)
二 烈山氏后稷与姬周后稷时代考辨	(419)
三 周族的来源与迁徙考辨	(425)
第五节 商族鸟图腾崇拜溯源	(432)
一 商族鸟图腾崇拜考	(433)
二 商族图腾崇拜的主体为雉凤说	(436)
三 《书·高宗肜日》雉鸣之谜与商族雉凤	
图腾崇拜	(440)
第六节 周人尚“火”与赤鸟赤色崇拜考	(444)
一 周人尚火的天文学证明	(445)
二 周人尚赤新证	(448)
三 周人尚火说与邹衍五德相胜说产生的	
历史背景	(450)
四 周人鸟崇拜现象考	(454)
第六章 小结	(459)
主要参考书目	(463)
英文提要	(469)
后记	(474)

第一章 絮 论

商周文化是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文化的源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周代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思想和文化传统，而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崇拜周公、笃信周礼的孔子，这就决定了周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而周文化是在继承商文化并总结殷商灭亡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因此，研究商周文化有助于我们认识儒家文化的来源，也有助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关于商周文化的比较研究，学术界有完全不同的两种论点。一种认为商周文化迥然不同；另一种则认为商周文化前后相因，大同而小异。前者可称为“迥异”说，后者可称为“微殊”说。“迥异”说的代表人物有王国维、郭沫若、邹衡、许倬云等人。郭沫若曾分别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方面指出了商周之际的大变化。^① 邹衡则从考古文物的角度进行了比较，认为先周与晚商是“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化”。^② 许倬云则从世界文化比较研究的角度，指出殷周之

①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

② 邹衡：《夏商周文化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页，第331页。

际是个大变局。^① 在“迥异”说之中,最早而且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从政治制度方面进行比较的王国维。他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认为这场大变革导致的结果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②

“微殊”说的代表人物有徐中舒、严一萍、张光直等学者。徐中舒通过考古文物和古文字资料进行了比较,认为殷周文化是相因袭的。^③ 严一萍比较了夏商周三代文化,认为三者是大同而小异。^④ 张光直虽然承认三代在地域及传说的礼制方面是有区别的,但从考古所见的物质文化上比较,认为三代文化是“虽有小异,实属大同”。^⑤

前贤们的研究成果是不小的,但均有不系统之感。比较可知,这两种说法的不同完全是由于参照系与着眼范围不同。“迥异”说者大多数(除了邹衡)是把商周文化放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大文化背景中去比较,而“微殊”说者则是仅在殷周两个时代的文化背景中去比较。笔者以为前者的方法是对的。分析商周文化的异同问题,首先应该把它们置入整个中国历史的大文化背景中去分析比较,通过远镜头式的观察分析它们和大文化背景的关系,抓住它们的特点及其区别;然后再把它们纳入相对的小文化背景中去具体解剖,通过近镜头式的观察比较,分析它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内部组织结构及其深层的价值观。这样才有可能把微观的比较和宏

① [美]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4~57 页,第 93~105 页。

②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第二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③ 徐中舒:《殷周文化之蠡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1931 年。

④ 严一萍:《夏商周文化异同考》,《大陆杂志特刊》(一),1952 年,第 394 页。

⑤ 张光直:《中国青铜器时代》二集,三联书店 1990 年版,第 34~38 页。

观的把握相结合。本书则试图用这种方式重新审视商周文化的异同问题。

—

把商周文化纳入整个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观察比较，则可见商周文化的各自特点是明显的，其间的变化是主要的。

1. 商周文化的多元现象与时地关系

任何朝代的更替，其文化则是有继承，有变化。但商周文化和后代各朝代之间继承变化的状态完全不同，秦汉以来朝代更替后，文化继承与变革的内容融为一体，难以区别；而周代商之后的周文化则呈现文化多元现象，周文化中的殷文化以及其他文化成分互不相混。以至春秋战国间的学者们在论述周礼、殷礼以至夏礼、虞礼时，如数家珍，毫不含糊。如《论语·八佾》说：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又如《礼记·明堂位》说：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这不仅反映了周人对过去数代的文化遗俗习惯记忆犹新，而且各先朝文化风俗礼制也长期保存在周代的各诸侯国家中。如宋人则以商人后裔的身份奉祀其社稷祖先，保存了商人的文化传统和习俗观念。而且商人后裔较集中的卫国、鲁国等方国则被允许保留商人的政治文化传统，《左传》定公四年记述周公命令鲁卫两国“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就是明证。《春秋》所见鲁国不但立有周社，

而且有亳社；祭鲁公用赤牲，祭周公用白牡；祭上帝先王行雩礼用辛日等，均可见鲁国周礼殷礼并存的文化二元化现象。在上古时代，人们认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所在地的传统礼仪习俗、神权观念必须因袭继承，不然，则反受其灾。《左传》昭公元年谓后帝“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依此可知，大火心宿“辰”本为居住于商丘的阏伯所主祀，后来商人居此地，也因此继承了主祀心宿“辰”的祀礼，“故辰为商星”。参宿本为居于大夏的实沈所主祀，后来唐人居住大夏并因袭了主祀参宿的祭礼。西周初年晋始祖唐叔又被封在这里，于是，晋人又继承了主祀参宿的礼俗，“故参为晋星”（《左传》昭公元年）。

风俗习惯礼制可以长期保存在一定的方国区域之中，是由上古时代的思想观念决定的。《礼记·王制》曰：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曲礼下》亦曰：

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祭祀之礼，居丧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国之故，谨修其法而审行之。

先秦时期习俗礼制因地制宜、修教行礼不求移风易俗的观念，被大一统之后的秦汉社会破坏了。《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会稽山刻石文字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思想：

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蛮夷戎狄婚姻形态是多式多样的，本无特别严格的“淫泆”与“贞洁”观念。《左传》文公十六年谓宋公子鲍

长得“美而艳”，他的祖母襄夫人想与他私通，这时国人却不以为失礼无道，竟然“奉公子鲍以因夫人”。《国语·晋语四》载晋文公至秦国后，秦穆公嫁给他五女，其中有自己的侄子晋怀公之妻怀嬴，晋文公不喜欢她。晋大夫司空季子给他讲了一番“异德合姓，同德合义”之理，并谓他与怀公子圉是“道路之人也”，“娶其所弃，以济大事，不亦可乎”。但到秦朝，秦始皇到东南方本为蛮夷之地的会稽山刻石书文想要整顿统一这些淫风陋俗了：“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羣，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可以说，统一文化习俗礼制的观念是秦代以来才产生的，这与商周时代的观念截然不同。

商周之际的文化变迁和后来朝代间的文化变迁其区别是明显的，商周文化多元性与秦汉之后的文化整合现象明显不同。可以说商周文化的变迁是多元并存式：周灭商后，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具存，并行不悖。而后来朝代之间的文化变迁是一元继承式：子体文化脱胎于母体文化，母体文化演化为子体文化，二者已融为一体。何为子体？何为母体？不追本溯源，则难以区分。

2. 商周制度文化的大变革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此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① 王氏此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今天观之，很有调整增删的必要。笔者认为商周制度的主要不同点可重新归纳为四点：(1)礼仪等级制度；(2)完善的宗法制度；(3)分封子弟之制；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第453~454页。